



■湖北編鐘國樂團演出。香港中樂團提供

編鐘活化豈易事！

香港中樂團第37樂季開幕音樂會「千年之聲·鐘樂蘇鳴」(9月13及14日)，邀來湖北編鐘國樂團合作，全套六十五枚二千多年歷史的曾侯乙編鐘成為焦點。1985年11月亞洲藝術節湖北省歌舞團帶來的「編鐘樂舞」，採用的仿製編鐘，只有半套二十三枚，這次香港中樂團經多方努力，解決眾多難題，全套六十五枚仿製編鐘首次於中國內地以外的地方演出，這將會加快將編鐘舞台活化的進程。

1978年5月在湖北隨縣出土的銅製曾侯乙編鐘，雖在地下埋藏了二千四百多年，大、中、小六十五枚銅鐘卻保持完好的音樂性能，十二律齊備，可演奏各種複雜樂曲，二千多年前的樂音，得以重現人間，為此該套編鐘有人稱之為「稀世奇珍」、「世界第八大奇蹟」，但稱之為「活的國寶」會更貼切。

編鐘國樂團誕生湖北

這套「活的國寶」的出土，一度引起極大哄動，繼而湖北省歌舞團據之編創的仿古歌舞節目「編鐘樂舞」，於1983年8月首演後，震動全國文藝界，隨後多年，該套節目不僅在全國各地巡迴，還到過日本、東南亞、澳洲及歐美各國巡迴，也到過台灣和香港。但在熱鬧了好幾年後，卻「無以為繼」，編鐘彷彿又再埋進土中，聲沉寂了。

筆者去年兔年歲暮時分訪武漢，參觀了珍藏於湖北省博物館內的出土編鐘原件，訪問了湖北編鐘國樂團團長張紅陽，和出席以編鐘作為主角、將出土文物活化的編鐘新春音樂會，才找得編鐘要活化所面對的種種困難所在。

中國湖北編鐘國樂團現隸屬於湖北省文化廳直屬藝術表演團體湖北省歌舞劇院，前身可以說是八十年代編創出「編鐘樂舞」的湖北省歌舞團。2004年7月歌舞劇院的民族樂團，由團員投票選出樂團的笛笛團員張紅陽出任團長後，開始進行改革，由一個民族樂團變身為一個編鐘國樂團，由省長基金撥出八十萬元，用了五十五萬元訂購了一套編鐘，餘款買了一套定音鼓，還有揚琴等樂器。2010年8月正式易名為湖北編鐘國樂團，至今樂團的入職編製人員已擴大到五十七人。但要將編鐘這套國寶樂器活化，卻仍有一段很長的道路。

當年仿製每套百萬元

1983年編創「編鐘樂舞」時，用的仿製編鐘只是

■在音樂廳中裝嵌編鐘的鐘架橫樑。周凡夫提供



一組，而非全套。也就是說曾侯乙編鐘自1978年出土後，完整的編鐘聲音始終未在舞台上出現過。為此樂團增購一套完整的編鐘及改善樂器後，成為一個民族樂團加上古老編鐘樂隊的組合後，全套編鐘的聲音才開始重現舞台。

民族樂團增購編鐘後，張紅陽便致力要將編鐘融入樂團中，力求將此一「國寶」活化，委約作曲家特別為編鐘及民族樂團創作曲，邀請省外指揮家到來指導，通過考核制度聘用新血壯大樂團。同時，並透過外訪登台，刺激樂團士氣，提升演奏水平，除應邀到過廣州中山紀念堂、星海音樂廳登台，還到過西班牙巴塞隆那(2006年)、法國巴黎波爾多(2007年)、澳洲悉尼(2009年)；在挪威、瑞典、法國等地巡迴(2009年)，先後兩次獲邀到北京國家大劇院登台(2009及2010年)，在上海世博會演出(2010年)。

曾侯乙編鐘原件陳列於湖北省博物館，在武漢民族樂器廠和武漢精密鑄造廠，及一大群專家的幫助下，1984年複製出第一套仿製編鐘，1989年複製出第二套，到1993年再複製第三套。每套編鐘之複製、造模和調音都極費功夫，需時一年之久；當年

不算人工，據說每套亦要耗用一百萬元人民幣。後來香港中文大學亦用了一筆款項訂購了一套以曾侯乙編鐘為藍本的「袖珍」複製品，因原件體積龐大，故只取其音律及體制，減為三十六枚，作研究、教學及演奏用。

化為零搬裝有竅門

編鐘中最大的鐘重量超過二百公斤，最小的也有二點四公斤，以堅實方木製成的曲尺形鐘架橫樑長十三米，高二點七米，橫樑兩端飾有青銅透雕，鐘座則是透雕盤龍，上有兩層佩劍武士，武士雙手托住橫樑，工藝精巧，結構造型極為獨特。當年最早仿製的編鐘只仿製了二十四枚，原因是估計全套仿製，重量會超過五噸，一般舞台難以承受得起！現時湖北編鐘國樂團仿製的全套編鐘重量更高達6.7噸，這才是編鐘要在舞台上活化面對的困難所在。

張紅陽亦承認這是編鐘樂團外巡迴演時要面對的困難，搬運和安裝都存在很多技術上的問題。但他說：「樂團兩次進到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加上其他演出的經驗累積，這些技術問題基本已解決，運輸上要拆件，化為零，搬運到舞台上，再化為整；同時，安放在舞台上，亦要考慮舞台承受力度的結構。其中最為關鍵的竅門是，在舞台地板上首先要鋪墊厚木板，再將編鐘安放在上面，才能將全套編鐘的力度平均分佈在舞台地面。過往整個搬運拆裝過程需時很長，單是安裝便要五個小時，現在大概兩個小時便可以了。」

去年樂團在武漢舉行新春音樂會的上午，筆者在琴台音樂廳便觀看過全套編鐘搬運安裝過程。但見全套編鐘拆散，各部件均編寫上相對應的編號；首先將編鐘橫樑架好，裝嵌橫樑的過程，要動用多達十位「力士」，前呼後擁配合下，才能完成。橫樑安裝好後，再逐一將大中小各枚銅鐘，按序裝上，不能弄錯。果然。不用一個上午，整套編鐘便完成裝嵌。



■編鐘國樂團團長張紅陽(右)與香港中樂團行政總裁錢敏華合照。周凡夫提供

這次香港中樂團將湖北編鐘國樂團十多位樂師邀請前來合作，全套編鐘便採用特製大型貨車，經由陸路穿省過市，自深圳過關搬運香港文化中心。中心的音樂廳舞台上亦要特別搭蓋台架來將編鐘的承托力分散。箇中確是要克服不少困難，才能將全套編鐘的樂韻帶到香港來。

人才不足教材亦欠缺

然而，編鐘要活化仍存在不少問題。國寶編鐘既是民族樂團中「獨一無二」的樂器，這亦意味着全國音樂院校都不會，亦不能提供編鐘樂器的演奏訓練，那便只能由樂團自己來培訓演奏編鐘的人才了。現時樂團主要集中在現有的專業打擊樂手，和演奏揚琴的樂師，培養各人成為編鐘樂手。然而，規範的編鐘教材卻沒有，所以長遠來說，還要根據作品來編寫有系統的編鐘教材了。

另一方面，現時能展示與別不同的編鐘獨一無二的特色的作品仍極不足夠，委約有能力有才華的作曲家，投入創作「度身定製」新作品，累積更多曲目，設計更多不同重點特色的節目，才有可能將此一「中國國寶」的絕世音韻發揮出來。這次香港中樂團和湖北編鐘國樂團合作的開季音樂會，除了演出唐建平的《楚天印象》，還特別委約了三首新作品，包括關運忠的編鐘、管風琴與樂隊《盛世華章》；英國作曲家John Howard的《Making War, Seeking Peace》，和德國作曲家老羅(Robert Zollitsch)的《鐘樂和鳴》，為編鐘曲目的壯大作出了貢獻。

不過，在中國內地藝術體制改革的倡議之聲此起彼伏的當下，當務之急看來仍非要投更多資源去創作編鐘作品。原因是儘管爭取得到「中國湖北編鐘國樂團」此一「國寶招牌」，張紅陽個人亦展示勃勃雄心，前景似乎一片光明，然而，筆者透過武漢之行作了較深入的了解後發現，實情卻是編鐘樂團的改革發展仍存在着極多不明朗的可變因素，面對的是頗為嚴峻的挑戰，這才是編鐘活化存在的最大困難呢！

敢觀 舞台

文：小西

本欄隔周見報，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金龍》的曖昧遊戲

《金龍》(Der goldene Drache)是德國著名劇作家羅蘭·希梅芬尼(Roland Schimmelpfennig)2010年的作品，曾經在全球多個城市上演，近年則進軍台北、澳門、香港等華人城市。最近，《金龍》則進駐香港，由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藝術總監陳炳釗執導，本月在香港文化中心劇場公演，成為今年新文本戲劇節的壓軸節目。得知陳炳釗將導演《金龍》一劇，筆者一直都十分期待。一則《金龍》的劇本本身甚有喜劇感，以陳炳釗此一家的戲劇節奏(精準而不失令人驚喜的「甩漏」)，以及他對喜劇的獨特拿捏與營造，再加上《金龍》本身文本結構的刁鑽複雜，跟向來走知性路線的陳炳釗，可謂珠聯璧合。

《金龍》的主要場景是位於德國某城市的一家中式/越式/泰式料理餐廳，而劇中的五位演員則「主要」飾演五位擠在「金龍料理餐廳」狹小的廚房空間中工作的亞裔移民。說是「主要」，是因為《金龍》不止金龍料理餐廳這條戲劇線索，除了飾演餐廳廚房廉價勞工之外，五位演員更在全劇四十八個場景中，分別飾演十七個不同的角色，而且他們不時交換角色，在爺爺、孫女、螞蟻、蟋蟀、外籍空姐、女人、男人、雜貨店老闆等角色之間，穿梭往還，夾演夾敘，加上幾條戲劇線索交叉互纏，十分複雜。然而，正如希梅芬尼自己所言，《金龍》並非狹義的寫實劇場，演員無需在固定的角色分配框架中「入戲」，他們只需本着嬉戲的態度大玩角色扮演，加上演員不時需要高速轉換角色，觀眾反而可以從中有某種抽離，看清

楚我們在現實中對諸式人等的刻板印象。在全球化年代，隨着人口跨境移民，異文化之間的接觸機會多了，但與此同時，人們不少仍不脫殖民時代的東方主義，(尤其是歐洲白人)以刻板形象閱人，《金龍》則以近乎惡搞的嬉戲手法，解構這些刻板印象。試想想，當年《金龍》德語首演，當一眾操德語的德國非亞裔白人，煞有介事的扮演草根階層的亞裔角色，演員的種族與角色之間錯位，除了令人莞爾外，更令人抽離與批判。就此而論，跟2012年的台北版《金龍》(台南人劇團)的綜藝節目式的喧鬧氣氛不同，陳炳釗的演繹更傾向於抽離與冷靜。例如，跟早前的澳門版的《金龍》(天



邊外劇團)有評論指出，在幾個華語版的《金龍》演出中，由於劇中的亞裔角色，都交由華裔演員去演，原劇中角色與演員的種族錯位，反而容易被忽略。但我認為，對於亞裔勞工，台北、澳門與香港並不陌生。所以，與其說《金龍》原劇中的種族向度，在華語版的演出中消失了，倒不如說這向度變得不明顯，比「白人飾演亞裔角色」的錯位更曖昧，也更對應現實。換言之，香港版《金龍》的現實與批判性，主要建基在某種辯證的曖昧上，讓人直面真實。